

朝向一种韦伯式政治经济学 ——对于韦伯现代国家与经济发展论述的初步考察

何 蓉

[摘 要] 基于韦伯政治评论文章与社会学理论论述,文章分析了韦伯思想对现代国家经济功能的论述,即一方面要以民族最高利益为考量做出最终的决策,另一方面要提供某种社会正义的前提。文章认为,韦伯的国家观不仅建立在民族或文化的概念之上,也强调了国家垄断暴力手段的强制性方面,而且建立在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之上,即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自由、独立、创新等经济心态和道德规范,以及志愿性的社会组织原则,从而在韦伯有关国家与经济发展的论述中提出了“社会”这一层次,为进一步建立韦伯的国家社会学或者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的某种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的起点。

[关键词] 现代国家; 经济政策; 社会

韦伯著作中论及国家的部分散见于其论述政治、经济等章节之中,总起来看,篇幅颇为显著,内容亦多样。例如,他在《经济与社会》中论社会学基本概念、官僚制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共同体等部分,以及《经济通史》《学术与政治》等篇章中,从不同角度或脉络提出了国家的定义、功能、构成、演变、支配的类型与国家的形式等内容。其中,国家与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主题,韦伯在不同章节中,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国家通过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满足自身经济需求、发挥经济功能,以及国家的历史演变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等相当丰富的内容。

可以想见,身处德国深厚的官房学传统之中,无论是其师长辈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还是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海德堡大学的同事耶利内克论国家的著述等,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韦伯的思考。他从 1908 年起设计的《社会经济大纲》的写作架构,就包括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下,现代国家的国内与国际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1]209}此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韦伯以政治讲演、评论的形式表达了对时事的看法,涉及德国的产业政策、政治事件和政治建制等诸多方面。

尽管如此,韦伯却并未对国家辟专章集中讲论。其相关文字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论述,一类是针对政治现实的评论文章。遗憾的是,前者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大纲》的体系,在体例上,多属下定义式的提纲契领之作,不仅韦伯自己因囿于体例、无法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而遗憾,而且,难免被后人指为“定义的堆砌”。^[2]后一类既包括韦伯在青年时期对于德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评论,也包括他身体康复之后,针对欧洲及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多次政治事件与政治变革,对德国政治的诊断与因应之策,其中鲜明的立场与价值的涉入又使得这些文字难逃意识形态论之指责,使韦伯得到了民族主义者、乃至帝国主义者的名声^①。

作为某种调和,温克尔曼在编撰名为《国家社会学》(Staatssoziologie)的韦伯政治文集时,试图

[收稿日期] 2010-10-18

[作者简介] 何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邮编:100732。

① 1959 年,沃尔夫岗·莫姆森发表《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认为韦伯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是其参与政治活动的驱动力。其观点备受关注,代表了战后年轻德国学者的历史性反思,这一思潮最突出见于 1964 年韦伯诞辰百年的纪念会,会议实际上成了针对韦伯的政治批判会,之前对韦伯十分推崇的雷蒙·阿隆亦发言支持莫姆森的观点。罗斯对于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批评加以总结,总结为“马克思主义的”、“纳粹的”和“自然法的”三种立场,1974 年,莫姆森的著作第二版对于相关论点有所修改。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从韦伯著作的修辞方面的转变,来表明将其有关“民族”的论述等同于“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之不妥,或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韦伯的民族主义的内涵及其与当代各种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关联。(见文献[3-5])

以去除价值判断、留其精义的方式来提炼其政论文中的理论内容,被认为不足以反映韦伯自身的立场。^{[6]14-15}而沃林的研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强化韦伯作为一个“政治的人”(political man)、其著作的政治的一面,甚至其方法论著作都是某种类型的政治理论。^[7]这两种立场的实质,是对于韦伯思想中学术与政治、政治社会学和政治评论之间的某些紧张或不一致的困惑。

而比瑟姆在其出色的著作《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之中,专门讨论了韦伯的政论文与学术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在评析米兹曼、卢卡奇等人的研究路径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一方面应当认可并正视这两部分著作之间的重要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时候,应将二者截然分开,即“韦伯政论的要点只能在政治关系中寻找,而其社会学的要点至少首先要在特定的科学传统中寻找”。^{[6]21}

不过,若以韦伯思考的一致(consistency)和完整(integrity)为前提,那么,政论文章不妨被看作是其理论立场在特定境况下的体现。毕竟,即使出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韦伯的政治评论也严格地恪守了其学者的立场,并不见得以作为策略的可行性见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正如韦伯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为在特定问题之下、对终极信念的验证,从而使自己的真正的意志得以显明。^{[6]29}

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尝试结合韦伯的政治议论与《经济与社会》等卷册中的定义性的论述,从前者中提炼有关论题,证诸后者,从而形成某种对勘,在此过程中,以国家与经济发展为线索,勾勒出其国家社会学的特定方面的可能样貌。

一、《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篇:国家的经济干预

韦伯很早就关注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例如,在他早年的经济史著作中,国家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呈现出这样两种样式,一种是罗马共和国时代,所谓的古代资本主义建立在贵族政治的基础上,随着殖民扩张,在公共土地上形成了私人的剥削与赢利;另一种是罗马帝国时代,追求政治上的和平和臣民的忠诚,逐渐演变成赋役制国家,并加诸臣民种种义务,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经营的“缓慢而确定”的消失。^{[8] 362-365}

具体到当时的现实,韦伯关注的焦点是德国农村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政策。

韦伯在 1890 年代初期参加了社会政策协会和福音派社会大会的农业工人调查的工作,并提交了报告,在此基础上,他在 1893~1894 年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奠定了他作为农业问题专家的地位,而农业与农村问题之所以受他关注,原因乃在于其政治上的重要性。^[9-11]

韦伯本人在 1904 年出席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期间的讲演,从现实的政治经济局面谈到了他对于农业问题关注的原因:一方面是欧洲大陆人多地少的现状、传统上对土地的重视、农村社会的古老秩序的存在和本质上是资源掠夺性质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冲击等原因,造成了农村问题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和德国政治问题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德国东部农业地区具有特别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是德国地主阶级——容克——的主要成分。这个阶级是德国普鲁士邦的政治领袖;而普鲁士邦又是德国的政治中心。普鲁士邦的贵族院(上议院)就是代表这个阶级;而普鲁士根据财产多寡为基础的选举法,又使地主在众议院(下议院)也占得主导地位”。^{[12]123}

由此可以看出,韦伯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与国家的作用、政治的影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罗斯在为《经济与社会》所写的导言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关联,甚至进一步地点出,“他(韦伯)的古典时代研究和易北河以东地区研究之间的主要的政治关联是这一问题,即‘帝国的兴起与衰落’”。^{[13] XLV II}

那么,具体地看,国家应发挥怎样的经济作用呢?在韦伯早期的论述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高调呼吁。

在 1894 年发表的《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的状况的发展趋势》(以下简称《发展趋势》)一文中,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竞争之下,封建领主制度下的地主变身为农业企业的所有者,而农业工人也相应地由传统的依附农民(instleute)转变为无产者,传统的双方利益分享格局转变为利益相对立。在东部地区,这一无产阶级化过程造成了一个由大量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的无产阶级大众,对于工人中阶级觉悟的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有产者以引入大量波兰劳工来应对。韦伯认为,东部地主的利益追求已经造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变化,由此带来的是文化的、民族方面的冲击,国家应予以积极的干预,即所谓的内部殖民(interior colonisation)或内部安置(interior settlement),通过国家机构系统地、逐步地收购东部地产,将其转变为国家财产,出租给富有的农民(farmer)并提供贷款用于生产改良,假以时日,将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利益。韦伯指出,这是“民族的最高利益”。^[14]

在其著名的^①1895年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②中,韦伯以更加鲜明的方式提出了两个旨在“维护德国利益”的措施,一是关闭东部边界,阻止外来劳工;二是由国家出面系统地收购土地,认为“这意味着既可以扩大王室领地,又可以让德国农民在宜耕土地、尤其是宜耕的王室外领地上进行系统垦殖”。这样,经由国家之手将东部土地转入德国人之手,加以垦殖和改良,不仅抵挡了东部地区的无产阶级化,而且促进了“德国化”。

对此,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是,为什么国家要积极干预经济?韦伯的立场显然不同于提倡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但与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例如施穆勒的建议也有差异:尽管施穆勒同样提出由国家收购土地,但从韦伯本人的叙述来看,对于“有组织地向宜耕的王室土地进行移民”这样的建议似未有提及。

而韦伯的演讲实际上也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指出,“让我们感到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就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worldly 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s power)”,在其中,“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我们眼中的‘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16]11}但他指出,国家的根本作用,并非扶助或约束,而应是促进经济力量的自由发展;担负着德意志民族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它在经济政策上享有最终的和决定性的权力。

在此,韦伯将民族及其利益提高到了具有某种神圣性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一时期进行统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的永久性权力政治的利益”,而“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政治的科学。它是政治的仆人。”^{[16]14}特别是,“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国界的,然而,一旦它要作出价值判断,就会受到特定人类血脉的约束”。^{[16]13}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人的科学,亦在于,“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令我们激动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我们认为构成了我们人性之伟大与高贵的那些素质”。^{[16]12}

这样,“经济民族主义者必须根据一个我们认为至高无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那些领导或渴望领导这个民族的阶级。我们关心的是它们的政治成熟性,也就是它们对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的领悟,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16]17}在此情况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严肃的责任莫过于意识到应在我们各自的活动范围中致力于我们民族的政治教育这个任务。这尤其也必须是这门科学的终极目标”。^{[16]22}

在这两篇文献中,韦伯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德国东部农村造成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后果,

① 但往往是充满非议与争论的名声,近来对这篇演说的较客观的讨论,参见文献[15]。

② 本文所引韦伯的政论文的译文以阎克文译《韦伯政治著作选》(见文献[16])为主,参照 Lassman & Speirs的英译本(见文献[17]),部分译文有改动。

即家长制生产关系向非个人的生产关系转变,相应地,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乡村容克—依附农的关系被打破,从政治格局上来说,容克阶级不再是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容克的政治立场是一阶级的政治而非国家或民族的政治。但与这种变局不相适应的是,不仅容克阶级、新生资产阶级不堪此任,而且,从整体上看,德国人在政治上远未成熟,为使他们具有长远历史眼光与使命感,需要进行民族的政治教育,而这将是这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的任务。

在此,韦伯所预设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文化前提是:其他民族在经济斗争中因其“低素质”而具备的竞争优势,已经构成了移民的大潮,将德国人排挤出东部地区,从而危及德国民族与文化的存续。而在德国政治中居重要地位的容克阶层出于切身利益却乐于使用大量的低廉且容易管理的斯拉夫劳动力。容克的利益却是民族之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经济干预就是在现实的政治考量之下的一个必要措施。

这两篇文献中,韦伯经济论述中的政治取向可谓愈来愈强,正当经济学的种种基于得失计较的思考方法大行其道之时,韦伯却提醒经济学家们,必得意识到自身的政治使命。这一政治不是着眼于日常利益分割与平衡的政策取舍,而承载着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的历史任务。在此处,国家因其所负荷的民族的权力、利益和文化等因素而具有超越直接经济利得的计较之立场、经济决策之功能,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指涉的政治共同体。此外,它还是广泛存在于国民之中的一种“心理基础”,而且“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政治本能乃沉淀在大众的无意识层次”。^{[16]18}

在就职演说中,韦伯明确提出了所谓“国家的理由”,即“民族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及其担纲者”,在德国经济政策上享有最终的决定权,在经济力量的自主发展与国家干预这两极之间,适时恰当地进行决策。应当注意的是,尽管韦伯在这一时期的议论中提出的是某种公有制或国家制的立场,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国家就是经济领域的主导。所谓“国家的理由”,表明的是国家作为某种集合性的力量及其价值上的正当性,而其实质措施或立场,则具有手段的、策略的意义,既有可能是积极涉入实际的经济活动,例如管制、扶持,也有可能是自由放任或激发经济个体的自主性。

经由这两篇文献,青年韦伯表达出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虽仍有待完善,但绝非青涩,在国家问题上的两个思考路向已经初具轮廓,一个是国家的民族、文化基础,一个是国家自身的治理,例如官僚制、议会民主制等体制。循着他所论及的国家及其经济干预的时机、理由等,可以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即国家本身的构成及基本的运行原则如何?而这也是成熟期的韦伯在不同的语境下试图回答和完善的问题。从国家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韦伯对德国在“一战”前后诸种选择的剖析,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分析。

二、《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篇:国家的政治选择及其经济意义

如上所述,在思想上,韦伯一方面认为存在一种超越等级或集团利益的全民族的“政治”,另一方面,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形式,他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在不同时期他分别对君主制、强议会制和民选总统制等予以支持。

例如,他访美国期间所作的关于德国农业与资本主义的演讲,就指出德国需要世袭君主制,他本人是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但同样支持君主制的存在。即使在他生前最后讨论民选总统制的政论文中,出于对政治领袖的倚重,他还表达了对历史上的所谓开明专制的君主们的赞许态度。再比如,尽管他对政党政治的利益争斗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他也指出,政党之间利用平等选举权等口号来争取支持的结果之一,就是平等选举权观念的普及和变成现实。^{[16]67}换言之,各个阶层或群体在政治上的成长,是政党利益之争的过程中收获的一枚意图之外的果实,政党政治在其后果的意义上具备了政治教育的功能。

除了国内的政治格局之外,近代欧洲及世界的政治风云也对韦伯的政治判断产生了重要的借

鉴意义。特别是在韦伯恢复健康之后的时期,对他政治立场产生显著影响的,有他在美国的经历(见诸“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8]121-140 293-305}有俄国1905年革命^{[16]24-61};特别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内国际的重大历史变革,他对德国的状况与前途表达了更多见解,例如《选举权与民主》《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和政府》《学术与政治》《帝国的总统》等篇。

其中,来自英美两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的经验明显形成了他认为是良好的借鉴。例如,他从英国国家与产业资本主义的关系上看到了理性的资本主义如何帮助英国的权力和人民纵横驰骋于全球各地,而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宗教根基、组织原则和制度演变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了他对近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的思考。而与此相对,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反面借鉴的法国、俄国,在他看来,其问题之根本并不在于政体的形式,而在于所谓的金融投机的资本主义形式与食利者心态的消极影响。对于韦伯的思考很有意义的一点是,这种来自国际的借鉴廓清了诸多技术性手段及其社会影响之间的某些因果关系。

因此,可以看出,他对于民族政治的思考,既具有超越价值的一面,又具有注重实效的一面,这往往为他带来民族主义者或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名声。但本文认为,若是从国家这一方面着力,毋宁说,韦伯在此强调的是,民族国家与经济、社会诸方面存在着实际的相互影响和关联;而且,国家自身有其历史的起源与发展的阶段,它所发挥的作用并非天然的和必然的。出于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展望,韦伯既非德国唯心主义某些传统中的对国家崇拜,亦非宣扬某种自然权利,而是基于民族与社会的现实,考虑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在韦伯看来,国家作为政治机构,其存在与运行和社会诸群体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体现在国家的经济功能、经济需求及其解决方式,乃至近代以来的国家产业政策等方面。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某些实际起作用的关联。其立场尤其可见于《选举权与民主》这篇时评文章。

从其主旨上讲,《选举权与民主》指出,旧时代基于经济条件而产生的政治资格的不平等已不复存在,新的经济方式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原则,从而表明在德国实行民主选举的必然性,以及基于社会正义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制度与现代经济的适应性。

韦伯在文中分析了几种不同的选举权方案,并一一指出其不足。一种是阶级基础上的公民权,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情况下,这一方案会引起一个非常刺眼的结果,即为德国赴死的士兵们却只能享受最少的政治权利,从而充分体现普鲁士的三级结构的不合理之处;一种是所谓文人墨客的一人多次投票权方案,韦伯重点批判了以教育程度作为投票政治资格的可能的荒唐后果,在他看来,考试和文凭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成熟;第三种是韦伯所说的“目光短浅的‘法律与秩序市侩’所创造的那个精神产物——‘中产阶级公民权’”,他从其“精神”的后果上,认为这将引起所谓食利者心态的膨胀,最终有可能造成德国经济的瘫痪。^{[16]71}

由此韦伯指出,实行民主选举是现代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从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经济领域生产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同样出现在军事与政治领域,武器和暴力强制等权力被集中到国家手中,因此,在人民中间,传统的出于经济因素而产生的军事和政治资格的不平等已经不复存在:

现代国家以一种真正持久而无可置疑的方式向它的全体公民提供了如下平等,即纯粹的物理安全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的平等,当然,还有赴死沙场的平等。以往那种由经济因素决定军事资格的不平等、由此产生的政治权利方面的所有不平等,于官僚化的国家与军队中已经不复存在。官僚系统那种无可逃避的平面统治第一次产生了现代的“国家公民”概念,而面对这种统治,选票就是唯一的权力手段,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予接受了官僚统治的人民以最低限度的共同决策权去决定他们有义务为之献出生活的共同体的各项事务。^{[16]87}

因此,“平等选举权是民族政治的需要”,而非政党政治中的口号。^{[16]87}作为一项制度,它并非要体现某种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而毋宁是对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现实的平衡。

而政治上的平等投票权将产生的一个经济上的后果是,给予经济工作最大程度上的理性化(即给予理性的生产性活动)以一种正向的激励。在此,韦伯的预设是现代的理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自由、民主、平等所谓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某种对应或亲和。而他由此所针对的,除了前述食利者心态之外,主要是战时经济所带来的典型的营利方式和组织原则等的变化,典型的是在战时出现的依靠政治投机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

那种依靠某些短暂的纯政治机缘为生的资本主义经营,与资本主义在和平时期的理性经营(Betrieb)有着巨大差异,前者靠的是政府合同、战争贷款、黑市暴利,靠的是一切营利和掠夺机会,靠的是冒险主义政策带来的获利和赌博机会,……,但后者的典型特征则是对赢利性的计算,……。这两种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或曰“道德规范”……——是彼此对立的,事实上可能就是两种精神与道德力量。^{[16]73-74}

此外,韦伯还提到了其他如战时的“共同经济”(communal economy/*Gemeinwirtschaft*)、“团结经济”(economy based on solidarity/*Solidaritätswirtschaft*)、“合作经济”(cooperative economy/*Genossenschaftswirtschaft*)等口号,或者是战后所面临的配给制度下的“过渡经济”。

在几种经济形式的对比之下,韦伯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对理性的生产性经济活动,即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推许,认为若无政治上的明智取舍,将会带来德国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瘫痪。

尤其是,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来看,不同的经济经营方式会造成不同的组织原则,这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不仅存在于社会关系的脉络中,而且它本身也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其关系类型因不同种类的经济活动亦有相应的差异。

韦伯指出,伴随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活动而出现的是志愿(voluntary)原则,而非等级制的“有机”原则,亦非职业团体“天然”利益和内部的团结。鼓吹共同经济、合作经济等的人没有看到,在作为一种强制性联合体(*Zwangverband*)的国家之下,“与战时经济相伴而来的是那些单一目的的大规模理性联合体(*Zweckverbände*)”,无法创造出象旧时代的那种等级意义上的“有机”结构。相反,韦伯指出,由国家组织各种利益集团的社团,没有志愿组织所具备的活力,而且,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一旦面临具体问题,往往会彻底失灵。^{[16]75-82}他认为私人资本主义与官僚化的并行意味着相互的牵制,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进行统治的就只有国家官僚系统了,从而产生一种单一、无可逃避的等级体系,那将产生类似于古埃及的后果。^{[16]129}

综上所述,在对德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况分析之后,韦伯指出,现代国家系于“国家公民”的概念,这意味着国民的政治的统一或一致;在经济上意味着对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支持与激励。韦伯认为,这应是致力于发展的现代国家在经济问题上应持有的最基本的政策,尽管由于种种历史的境遇,还会出现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强制;在社会组织上意味着志愿性的原则,即理性个体的志愿联合,排除了等级制的、国家强制的组织原则。

三、讨论: 国家何以促进经济发展

前述对韦伯政治方面著作的梳理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即使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本文也只选取了相当有限的文本,未曾涉及其中关于民主选举、议会制度、总统制等相当丰富的内容。本文试图提出的一个初步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在韦伯对德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评论文章中,了解他关于政治与经济、尤其是现代国家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立场,例如,国家是否应当、如果应当的话又如何干预经济的发展?

在韦伯的时代,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的讨论非常热烈,例如,重商主义、自由放任、帝国主义、社会

主义等不同发展方式或经验。而韦伯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呈现出其思考的复杂与丰富。

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来看,韦伯著作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始终是非常紧密的,他对于政治团体满足经济需求、分担支出等方面的论述都在说明这一点。而且,如前所述,韦伯在对古代西方社会的研究中提出,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转变,在经济上是古代资本主义从蓬勃发展到衰落、自给自足经济兴起的演变过程,其中,国家的政治目标、财政手段等对于这一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于国家政治的经济后果的强调,在韦伯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得到了延续。例如,一方面,从其经济史讲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导言等文献来看,西方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近代以专门的官僚阶级与合理的法律为基础的国家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举凡国家的任何制度或政策设计,无论是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还是与经济有关的,或者是具有经济方面的影响的,都会产生经济的、政治的乃至伦理的示范意义,并且产生相应的社会经济心态,从内在驱动力的层次发挥其影响力。

特别是,在前文所引征的几篇政论文中,韦伯所思考的是现代国家的经济政策问题。他针对不同时期的经济格局,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手段:在就职演说中,韦伯提出的是非常积极的经济干预政策,即国家逐步收买庄园土地,使其转变为国有土地,并安置德国农民耕作,提供贷款和技术改良等支持。在“选举和民主”篇中,韦伯提出的是国家面临不同的经济类型时应审时度势,加以取舍,尤其是,他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性经济活动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相辅相成的。

从具体的措施来看,这两种方式似乎有一些差异,前者是某种国有化,后者却在提倡资本主义的私人经济。若要进行深入比较,需要有社会经济史的资料予以补充和评估,以便了解他在不同境况下提出的因应之道。限于篇幅及内容,本文仍然只从韦伯文本中获得对这一差异的解答。

具体地说,在前者,韦伯的措施试图打击的是一个所谓政治上没落的阶层——容克,传统的容克与依附农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瓦解了,容克阶层不再是共同体利益的代表,反而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而引入外籍劳工,从而造成民族和文化方面变化的危险。在此情况下,国家作为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权力的担纲者,在德国经济政策上享有最后的和决定性的权力。不过,他同样指出,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 of state),并非强调“来自国家的帮助”(help from the state)而否定“自助”(selfhelp),并非“经济生活的国家干预”(state regulation of economic life)而否定“经济力量的自由发展”(free play of economic forces)。这表明,国家所享有的最终的决定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强制,后者只是一种在合适的情境之下可能的策略选择。

在后期的政论文中,韦伯更明确地表现出对于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赞许:相对于依靠政治机缘、投机、冒险等获利的所谓战时的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所代表的是积极进取然而具有道德规范的经营方式;相对于由国家组织的种种利益集团的社团,虽然号称是志愿组织,实际上却是强制性的志愿,而志愿性组织基于个人的自由、独立和首创精神,它产生于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韦伯认为,其组织形式和志愿原则将会导致德国社会与政治的根本改变。

因此,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者是保护或保证民族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其手段可能是政治的、军事的,也有可能是经济的措施,无论这措施是经济干预还是经济自由,其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者是国家要实现社会的民主化,即与责任相匹配的平等的政治权力,平衡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并给予现代理性的营利方式以正向的激励。

上述第一种作用,或可称为一种具有封闭性边界的最大化潜能,其边界是由领土、民族、语言、习俗、文化、情感等确立起来的,具有排他性,民族的利益就是它的最高价值,而其手段或选择集则是多样的。这一点能够解释韦伯对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注重实效的立场,例如,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战时经济、合作经济甚至政治资本主义营利方式的特定作用,并分析了其出现的条件。

不过,他同样指出,国家在战争等特殊时期采取的措施,不能照搬到和平的发展时期。在他看

来, 与现代国家并肩而行的是基于理性的计算而建立起来的生产性经济活动, 即现代的理性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应当对这样的经营方式提供激励, 因此, 国家的第二种作用, 毋宁说是为理性的经济活动提供的某种社会正义的前提。

但是, 国家所发挥的这两种经济方面的作用, 其立足之处在哪里?

特别是, 韦伯在其《社会学的基本概念》^{[19] 76}《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绪论》^{[18] 4}《经济与历史》^{[20] 166}《学术与政治》^{[21] 196}《经济与社会》^{[22] 905}等处对“国家”及其充分发展了的现代形式的国家予以限定, 指出其以特定地域为基础的强制性机构 (*gebietssanstatm aessig*) 的本质, 以及专门的行政管理、合理的法律秩序、独占的暴力支配等特征。但是, 他指出, “纯就‘概念上’而言, ‘国家’对于经济来说, 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是必要”^{[23] 229}。

这也就是说, 国家对于经济的种种手段或政策, 并非某种天然的权力, 而是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的功能。在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之间, 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撑的关系: “市场结合体关系 (*Marktwergesellschaftung*) 的全面性支配, 一方面需要一种按照理性规则而具有可计算性功能的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 伴随着此种支配而来的特殊倾向, 亦即, 市场的扩大, 基于其内在的因果逻辑, 将有助于一个普遍主义的强制机构 (国家)、借着解散一切分立的、多半奠基于经济独占而来的身份性强制组织或其他强制组织, 而独占与规制所有‘正当的’强制力。”^{[23] 229-230}

在此, 法律秩序之突出作用, 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 传统、习律与习俗都不能再发挥其约束力, 而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却又比以往更加尖锐地分歧对立, 在国家的强制力保障之下的法律体系可以为基于契约的现代经济提供交易的保障。

在这里, 韦伯提出了国家经济功能的一个历史演进的角度。尽管现代之前的种种政治组织都有其经济的举措, 但是, 在现代国家对于法律等强制手段的垄断前提下, 才有连贯的、首尾一致的国家经济政策, 最早如重商主义, 在近代初期, 卷入权力斗争的各个政治组织, 由于政治原因和货币经济的扩大, 需要更多的资金, 结果导致新兴国家与被追求且具特权的资本家之间令人侧目的结盟。此乃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为重要的“接生婆”。^{[23] 253} 韦伯认为, 这是 14、15 世纪以来英国经济制度的根本, 其本质在于把资本主义的营利观点灌输到政治上, 国家似乎是只由资本主义企业主所构成, 最终这种依赖国库财政、殖民机会和国家垄断的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势力渐渐消退, 代之以清教伦理影响之下的理性资本主义类型。^{[20] 173-177}

这里的一个相关的问题是, 韦伯是否在表明, 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与他所谓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对应性的关联? 特别是, 韦伯在论述俄国政治时曾经断言, 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并无所谓选择性亲和, 现实的情况毋宁是, 现时代的资本主义愈发达, 个人主义的自由丧失愈充分。^{[16] 57-59}

应当看到, 韦伯在如此论断时, 主要针对的是 1905 年革命后的俄国, 他认为, 若无民族的自主自决意识, 人为输入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模式并不自动带来预想之中的结果。在这里, 韦伯强调的仍是国民的政治教育等基本问题, 对于这类后发的资本主义类型来说, 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自由民主等观念的普及与妥当的实施。或可说, 在俄国的案例中, 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思想氛围尚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民主。

在此, 韦伯仍然在强调现代资本主义所培育出来的个人的理性自觉、道德规范以及志愿的组织原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是本质上是等级制的社会有机体传统, 还是在国家的强制力主导下的种种组织形式, 都无法与理性的资本主义相抗衡。

在此可以看到, 在韦伯有关现代国家的兴起与发展的论述中, 往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突出了其强制手段的独断趋势, 但由经济方面入手, 可以看到现代国家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即容纳各种传统的和新兴的社会关系类型的统合趋势。在此意义上, 现代国家不仅是一个基于领土、独占暴力手段等的强制机构 (*Anstalt*) 或具垄断地位、特殊的政治团体 (*Verband*), 它还是一个具有统

合意义的政治共同体 (*Gemeinschaft*)。

这种统合的含义, 不仅在于其中基于语言、习俗、宗教等而形成的民族的、文化的、权力的共同体性质, 而且在于它包容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各种联结方式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类型。特别是, 尽管现代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是所谓的切事的态度, 但是, 在人们基于理性和志愿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结合体关系中, 同样会形成新的共同体关系, 即所谓结合体相联结的、“包含性的”共同体关系 (*uebergreifende Vergemeinschaftung*), 或者是给共同体行动的参与者带来远超团体特殊目标范围的有利关系 (“门路”, *Konexionen*), ^[23] 242- 243 等等。

这种统合性质为理解韦伯的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 在韦伯论及国家的内容中,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不可忽视的一个“社会”的维度, 这一社会, 指的是“人类共同体的一般结构形式”。^[23] 255 它一方面建立在滕尼斯有关共同体与结合体的划分方式上, 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划分是连续性的而非对立的二分。一个典型的表现即是上文所说, 在现代理性的、切事的结合体关系中, 又会产生新的共同体关系。因此, 在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带来了结合方式的变化, 不是排斥性的, 而是加入了新的成份。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韦伯指出了国家在经济、政治决策上具有某种超越性地位——一方面, 超越个体经济单元的利害计较, 从而具有一个总体的、最高的利益; 另一方面, 现实的情况是社会条件加诸个体身上的种种不平等, 国家政策因而具有一种社会正义的意义, 对社会的平等加以制衡。但是, 这种位置并非某种天然或天赋的权力, 而是基于国家可以统合诸种人类共同体关系及其组织原则等意义上形成的, 这是国家的强制性本质之外的另外一个现代特征。在这个意义上, 尽管韦伯对于“社会”概念并无专门的处理, 但是, 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体的一般结构形式”意义上的社会, 支撑起了国家在经济等事务中的最终决策者的角色。

在此基础上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是, 国家的这种地位及作用, 应以何种方式来履行? 由此涉及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等技术性的安排, 这便是韦伯政论文的另一个内容丰富且发挥了重要的现实影响的部分。不过, 本文的目的则在于, 指出韦伯的现实政治立场绝非自由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之类的标签那么简单, 在他关于现代国家与经济发展的论述中, 引入了作为人类结合方式之一般形式的“社会”的概念, 从而有可能从德国知识传统中长期的有关国家与社会的讨论的背景理解韦伯的一般社会学理论。由此还可以展望,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 或可建立起一种全面的、足以囊括韦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类型学的新的政治经济学。

[参考文献]

- [1] 斯威德伯格.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 何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2] Tenbruck F H. The Problem of Thematic Unity in the Works of Max Web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 31: 316- 351
- [3] Roth Guenther. Political Critiques of Max Weber: Some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5, 30: 213- 223
- [4] Pabnen Kari. Was Max Weber a “Nationalist”? A Study in the Rhetoric of Conceptual Change. *Max Weber Studies*, 2001, 1(2): 196- 214
- [5] Noikus Zenonas. Max Weber 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olitical Economy before Political Sociolog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3, 29(3): 389- 418
- [6] 比瑟姆(原译为贝顿). 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 徐鸿宾等, 译. 台北: 久大、桂冠, 1990
- [7] Wolin Sheldon S. Legitimation, Metho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1981, Vol 9, 3(Aug): 401- 424
- [8] Weber Max.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R. I. Frank(trans.). London: NLB, 1976
- [9] Tribe Keith. Prussian Agriculture—German Politics: Max Weber 1892~ 1897. *Economy and Society*, 1983, 12

- (2): 181–226
- [10] Riesebrdt Martin. From Patriarchalism to Capitalism: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Max Weber's agrarian studies (1892–93). Leena Tanner (trans.). *Economy and Society*, 15(4): 476–502
- [11] Roth G. Max Weber's Articles on Germa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06/1907) and their Political Context *Max Weber Studies*, 2006 6(2): 183–205
- [12] 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甘阳等,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13] Roth G. Introduc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14] Weber Max. Developmental tendencies in the Situation of East Elbian Rural Labourers *Economy and Society*, 8(2): 177–205
- [15] Barlett J.M. Max Weber's Inaugural Lecture and its Place in his Sociolog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2001 1(2): 147–170
- [16] 韦伯. 韦伯政治著作选. 阎克文,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 [17] Weber Max.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Peter Lassman & Ronald Speirs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4, copied and published by 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Publishing House, 2003
- [18]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苏国勋等, 译.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
- [19] 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顾忠华, 译.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
- [20] 韦伯. 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 康乐等, 译.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
- [21] 韦伯. 学术与政治. 钱永祥等, 译.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
- [22]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1968]
- [23] 韦伯.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康乐, 简惠美, 译.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

Toward a Weberian Political Economy:

On Weber's Discussions of Modern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Ro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x Weber's economic history, the rise of national stat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western capitalism. Focusing on his political as well as sociological writing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functions of modern state, i.e., to make decisions on behalf of national interest with social justice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s. In contrast to the label of "nationalist" attached to Weber, this article argues Weber's theory of modern state bases not only on nation or culture, but also on western capitalism, especially its economic mentality, morality and voluntary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Thus modern society as a general structure of human groups supports and defines the functions of states.

Key words Modern state; Economic policy; Society

(责任编辑: 谢元媛)